

書評

考古人類學刊 · 第 91 期 · 頁 131-138 · 2019

DOI: 10.6152/jaa.201912_(91).0005

Book Review: Ching Kwan Lee.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林 孟 瑞 Meng-rung Lin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碩士

全球中國的幽靈：經驗與理論的幽靈

中國資本是什麼樣貌？我們要如何分析全球中國（Global China）？搭上近年逐漸流行的全球中國研究，以及在中國海外經濟擴張下的地方陰影，李靜君的得獎新書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以一個挑戰常識經驗現象的宣稱出發：「中國在非洲進行的海外經濟擴張，並不能夠視為殖民主義的結果。」李靜君認為，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活動展現出如同殖民主義般的行為野心，但其經濟活動在執行過程裡，並不等同於殖民主義的社會現象和結果。職是之故，若以殖民主義作為分析中國在海外的經濟行為，以及其所施行的地方社會，既不精確也無法生產出符合學術意義上的解釋。既然如此，我們要如何捕捉全球中國的幽靈？李靜君選擇以「資本」出發，他要問的問題是：「中國國家資本到底做了些什麼？它透過什麼樣的程序和機制？它和其他形式的外國資本又有何不同？」進而追問：「在尚比亞，中國國家資本有哪些特殊的機制、利益、權力和限制？對於非洲國家和勞動者來說，在哪些條件下中國國家資本會成為全球私人資本的替代方案？」（頁 3）透過建立兩組分析標的並比較中國國家資本和全球私人資本、尚比亞國內的銅礦業和基礎設施營造業，李靜君建立了一個研究模型，在其中，全球中國的幽靈如是顯影。

李靜君認為，全球中國應該被視為中國在國內資源和獲利的生產瓶頸下，試圖向外尋求空間性和政治性突破，也在相同的脈絡下，是國家和全球過度積累衰退後，相互遭逢所產生的現象，而這個現象並未有任何注定或保證的後果（頁 xii）。換言之，這僅是當代資本主義運作裡，在歷史進程之下，多重政治制度和社會過程交錯嵌合所產生的事件（event），就像 1920 年代的經濟大衰退與 2008 年的金融大海嘯，都只是資本

主義事件性 (eventful capitalism)¹ 的顯像。在中國內部，經濟成長趨緩帶來的政治與社會壓力，迫使中國向外輸出經濟計畫和勞動力；² 在非洲，則是資源國家主義 (resource nationalism) 和後殖民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競逐下，一方面渴望透過自然資源發展，另一方面卻又無法擺脫資源依賴的國家。從這個角度來說，全球中國並非僅有中國一方的巨大形影投射，地方 (host country) 也在經濟活動的參與中操作利益槓桿，透過政治過程、制度化、甚至文化等等社會面向共同促成了資本在地方的配置和安排。

從「多樣的資本主義 (varieties of capitalism)」到「多樣的資本 (varieties of capital)」

李靜君的理論傳統，上承博蘭尼在其作《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olanyi 1944) 中所浮出的提問：「市場如何嵌入社會整體？」(Block and Somers 2014: 65) 博蘭尼將經濟視為社會整體性的制度安排，³ 是一種政治性的過程。既然市場制度必須被鑲嵌，則必然不存在單一形式的資本主義，而是由不同的制度布局型態賦予出多種形式的資本主義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Block and Polanyi 2003: 299)。然而，李靜君認為，對非洲當地國家與公民來說，資本主義在非洲只有一種顯象：「全球新自由主義化的市場經濟。」既然如此，當各方外來資本進入尚比亞，其所競逐的場域是一個經歷國有化到私有化轉型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在此市場上，只有多樣的資本 (varieties of capital) 在新自由主義市場的地方 (local) 被在地行動者認識，甚至協同共作。在李靜君提供的框架裡，他抓取出全球私有資本 (global private capital) 與中國國家資本 (Chinese state capital) 作為比較，從中探析何謂中國國家資本。

「何謂中國國家資本？」「中國資本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資本嗎？」這是非常普遍的問題發端。關於中國資本的討論，主要循著「中國國家資本主義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和「資本主義在中國 (capitalism in China)」兩種路徑，前者敘述黨國對政治經濟體制的控制，標示出資本的中心化，後者揭示資本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是由下而上的驅動，包含了多層次地方和協作者的競爭，展現資本的去中心化。兩種路徑都摹繪出「中國資本主義」的特色，但卻遺失了「資本」的具體性和競爭性，無法用以理解在全球中國研究下，多樣化的地方如何與之回應（頁 5）。因為無法識別出政治作為形塑資本利益的首要性和中國國家資本在非洲的影響，以及資本主義的事件性本質 (the eventful nature of capitalism)（頁 10），李靜君將分析概念由多樣的資本主義

(varieties of capitalism)，轉向為多樣的資本 (varieties of capital)。李靜君建立了兩組對比：「全球私人資本與中國國家資本」以及「銅礦業與基礎設施營造業」。銅礦業在尚比亞占有重要的社會與經濟意義，在新自由主義銳行至非洲大陸時，尚比亞的銅礦業也開啟了從國有化到私有化的進程，在眾多進入的外國資本裡，只有來自中國的資本帶有國家資本的色彩；⁴ 在基礎設施營造業方面，尚比亞的國內建設需求，謀和了中國為紓緩境內的社會與經濟壓力所進行的海外突破策略。在這層現象意義之上，李靜君選擇回歸資本性質的探究。由此，他回溯至馬克思和韋伯的分析傳統：積累 (accumulation)、生產 (production)，與文化精神 (ethos)。

比較觀點：積累 (accumulation)、生產 (production)、文化精神 (ethos)

資本透過積累生產價值。資本如何積累？資本如何部署勞動力並配置生產關係？文化精神如何影響資本的性質？私人資本與國家資本最大的差異在於其所追求的利益動機不同；前者向投資者與利害關係人負責，追求一定時程計畫內的利潤極大化，後者遵循政治、經濟、社會等複雜交錯的國家戰略考量，追求策略意義上的利益目標，此兩者在積累的邏輯 (logic of accumulation)、勞動的體制 (regime of labor)，與管理上的文化精神 (ethos of management)，展現出不同的操作方式，連帶也讓地方針對兩種資本產生不同的認識與回應。

以銅礦業來說，私人資本追求的是創造出銅礦的最大交換價值。這些公司透過賣出原始銅礦或初階加工後的礦物獲利，在國際銅價高點時加大生產量能，在國際市場疲靡時減量生產，甚至停工以控制成本。因此，私人資本投資的礦物開採公司傾向層層分包聘僱礦工人力，以短期勞動契約和經常性的縮減，甚至關廠經營策略，應付頻繁易變的景氣週期。私人資本創造出極度不穩定的勞動條件，一方面礦工們必須時常面對被裁員的風險，另方面也無法創造勞動階級的團結意識，工人與工會之間的關係維持矛盾又吊詭的關係。相較於前者，中國資本追求的是銅礦的使用價值。中國礦業公司在尚比亞採集的銅礦，是為了符合中國經濟政策對銅礦資源的需求，原始礦物並沒有價值，經過加工生產後才能滿足中國的利益。在這樣的動機下，國際市場的起伏並不會影響中國礦業公司在尚比亞的生產排程，他們基於便於管理的理由，傾向單一包商，同時也更願意給予礦工長期穩定的合約，但其薪資水準、勞動安全設備與員工福利方面，條件都遠低於私人資本所經營的礦業公司。在兩者的差別之下，產生了一

種近乎違反常識的結果：在中國資本公司內工作的勞工們，更能夠透過工會組織罷工與協商，向中國資本所投資的礦業公司要求更好的勞動條件與福利，這些公司也比私人資本公司更長期且更彈性地經營在尚比亞的礦場。

而在基礎設施營造業，或許受限於田野條件，書中並沒有提供太多私人資本和中國資本的比較。不過，中國在尚比亞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充滿了典型的國家策略意圖，也完整彰顯了中國國家資本的文化精神。營造業不僅是基礎設施的建設，也伴隨著大型的融資與借貸方案。中國銀行藉由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尚比亞除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傳統國際金融援助機構的替代方案：可以更迅速地獲得長期穩定的經濟援助，然而卻必須付出更高額的貸款利率。向海外輸出融資和借貸方案，也屬於中國整體經濟策略的一環。中國在尚比亞的基礎設施營造業的投入，某些程度上符應了中國為紓解因為漸趨疲緩的經濟表現和過剩的勞動力所造成的社會治理壓力。來自中國的營造公司招募大量剛畢業投入市場的年輕勞動力前往尚比亞，並在尚比亞建立集中管理的宿舍、餐廳，以及休閒空間。這些來自中國的勞工，上至管理幹部，下至基層勞動者，雖然絕大多數是出於個人的經濟理性動機⁵選擇前往尚比亞工作，但卻有強烈的，帶政治性的集體意識。「吃苦」、「認真工作」、「存錢回國」，成為這些中國勞動者堅定不移的信條，完美地實踐工作紀律成為發揮個人價值、捍衛國家榮譽和民族自尊的一種形式。這種意識型態，以及在產業裡彰顯的文化精神，普遍存在於銅礦業和營造業中。來自中國的勞動者很少和當地社群往還，也因此，集中管理、刻苦工作、遠離社會的勞動群像，也在當地產生了都市傳說：這些工人都是被中國政府放逐到海外服勞役的犯人。

人類學家還可以做更多什麼？

綜觀上述，李靜君在此書展示了極大的野心。在經驗現象意義上，李靜君挑戰了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擴張作為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現象的宣稱；在理論意義上，他擴充了博蘭尼經濟鑲嵌性的問題，重新闡釋了資本的多重樣貌。李靜君並非挑戰國家資本的現有理論，而是透過比較分析來描繪出中國國家資本的獨特性（頁 4），他企圖以韋伯式的理想型概念（ideal type），為全球中國建立一個分析模型，並以中國在非洲的案例，提供經濟社會學者從「多樣的資本主義」到「多樣的資本」的理論轉移，他的嘗試無疑是成功的。

李靜君提到，唯有透過個案延伸方法（extended case method）和比較民族誌（comparative ethnography），將地方層次的運作關係放置在歷史性的脈絡中，連結起微觀層次的經驗過程和巨觀層次的結構與力量，才能將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的意義鍛造出來（頁 21）。在這本書裡，李靜君運用兩組對比和民族誌田野，將研究方法操作得非常漂亮。然而，對於人類學家來說，這本書所呈現的田野材料或許太過乾淨，甚至太過完美地令人遲疑。⁶真的可以切得這麼清楚嗎？如果中國國家資本的形貌是在中國、地主國、以及地主國人民，甚至在資本主義不可預測的事件性（eventful）和可預測的循環性等多方互動關係之下才能顯現其輪廓，有哪些行動者的身影在資本與地方的相遇過程裡被隱而不見、甚至交相變裝扮演？這應當才是人類學家真正感興趣的問題。

舉例而言，李靜君雖然不斷強調非洲國家和當地人民的回應，共構成為中國資本在地方的樣貌，也成為地方得以操作並攫取利益的槓桿，但他僅以概略性的描述回顧尚比亞自殖民時期以來的抗爭傳統（struggle legacy），用以分析國家和工會在談判協商過程的策略，忽視了抵抗（resistance）也是地方回應資本、形塑資本的豐富面向之一。李靜君以積累、生產，和文化精神作為分析標的，但讀者卻見不到中國和尚比亞勞動者的認識觀點與文化行為。在他擘劃的清晰大圖像和模型架構裡，我們也見不到那些因為察覺工作的不穩定（precarious），但又無法進入更好勞動市場的年輕尚比亞礦工們，如何運作微型貸款的機會，「不斷積極地準備最終的離開[礦工作]」（頁 147）。在中國資本進入當地運作與安排之下，當代失去村莊農地，在城市裡成為無產階級的年輕尚比亞工人，已經體會到他們這一代「從就業的文化，轉變為創業的文化（頁 148）」，這種對於自我位置改變的主體認識，會如何反應在尚比亞社會的變遷，甚至成為地方與全球新自由主義市場相逢後，資本如何彰顯在個人行動上，與之抵抗、對話、或串連，進而真正地參與、形塑資本的多樣變貌？這或許才是人類學家比較關心，也最擅長的發力之處。

回顧過往文獻，曼徹斯特學派有非常扎實的非洲研究傳統（Gluckman 1940; Turner 1957; Burawoy 1972）⁷，而（全球）資本主義進入地方後，如何與當地（local）相遇，以及不同的社會文化如何回應，人類學家已經有非常多精彩的文章提煉出資本的多樣性面貌及內涵（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0; Ferguson 1999; Taussig 1977）⁸。承繼過去豐厚的學術遺產，我們可以問的是，在當代最流行的全球中國研究裡，人類學家能在哪些部分做更多？藉由李靜君此書所指引出的開拓地，在未來，人類學於中國研究、

全球資本和地方研究等領域上，勢必足以令人期待。

附 註

1. 資本主義事件性 (eventful capitalism) 討論資本主義的自我強化、抽象性、擴張性，以及其超事件性歷史 (hypereventful history) 之間的相互辯證關係。見 Sewell (2008)。
2. 例如一帶一路經濟建設計畫。
3. 博蘭尼的社會整體概念，近似於涂爾幹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 (totality) 的概念。博蘭尼以此整體概念為基礎，將經濟作為社會整體的一種制度安排，擴充至世界經濟的討論。對博蘭尼來說，在國際層次的分析上，如同國內層次，市場社會也需要制度性的安排 (Block and Somers 2014: 65)，也就是金本位制 (The Gold Standard System) 在國際經濟體制裡扮演的核心角色。
4. 李靜君並沒有要重新討論國家資本的性質。在本書立場，資本不是由國籍、種族區分，而是由資本的利益驅動來源，分為私人資本和國家資本。從此立場出發，在尚比亞有來自全球北方與南方 (global North and global South) 的外國資本，但只有一種國家資本，來自中國。
5. 在尚比亞的薪水更高，可以更容易存錢。早期海外招募甚至提供非常吸引人的條件：海外工作期滿回國後，公司提供北京戶口（頁 106）。
6. 此處得自於筆者與同儕黃立元的討論。
7. 布洛威是李靜君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在本書前言，李靜君自承其曼徹斯特學派和非洲研究的學術系譜。
8. 或是更精準地說，當地人所見所識的資本。

參考書目

Burawoy, Michael

1972 The Color of Class: F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Zambianiz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Block, Fred, and Karl Polanyi

2003 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2(3): 275-306.

Block, Fred, and Margaret R. Somers

2014 The Power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Karl Polanyi’s Critiqu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4159/harvard.9780674416345

Comaroff, Jean, and John Comaroff

2000 Millennial Capitalism: First Thoughts on a Second Coming. Public Culture 12(2): 291-343. doi: 10.1215/08992363-12-2-291

Ferguson, James

1999 Expectation of Modernity: Myths and Meanings of Urban Life on the Zambian Copperbelt.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luckman, Max

1940 Analysis of a Social Situation in Modern Zululand. Bantu Studies 14(1): 1-30. doi: 10.1080/02561751.1940.9676107

Polanyi, Karl

1944[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Sewell, William H.

2008 The Temporalities of Capitalism. Socio-Economic Review 6: 517-537. doi: 10.1093/ser/mwn007

Taussig, Michael

1977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 amongst a South American Peasantry: Devil’s Labor and the Baptism of Mone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2): 130-155.

考古人類學刊 · 第 91 期 · 頁 131-138 · 2019

doi: 10.1017/S0010417500008586

Turner, Victor

1957 Schism and Continuity in an African Society: A Study of Ndembu Village Lif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for 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